

——基辛格回忆录

白宫岁月



白宫岁月

—基辛格回忆录

第 一 册

〔美〕亨利·基辛格 著

陈瑶华 方辉盛 赵仲强 译
钱乃复 江瑞熙 帅 鹏

世界知识出版社

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Limited, 1979
根据利特尔·布朗出版公司一九七九年版译出

封面设计：孙 政

白 宫 岁 月
——基辛格回忆录
第 一 册

〔美〕亨利·基辛格 著

陈瑶华 方辉盛 赵仲强 译
钱乃复 江瑞熙 帅 鹏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阜成门外展览路24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18 插页：4 字数：432,000
1980年9月第1版 198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

书号：3003·1612 定价：1.90 元



Dr. Henry Kissing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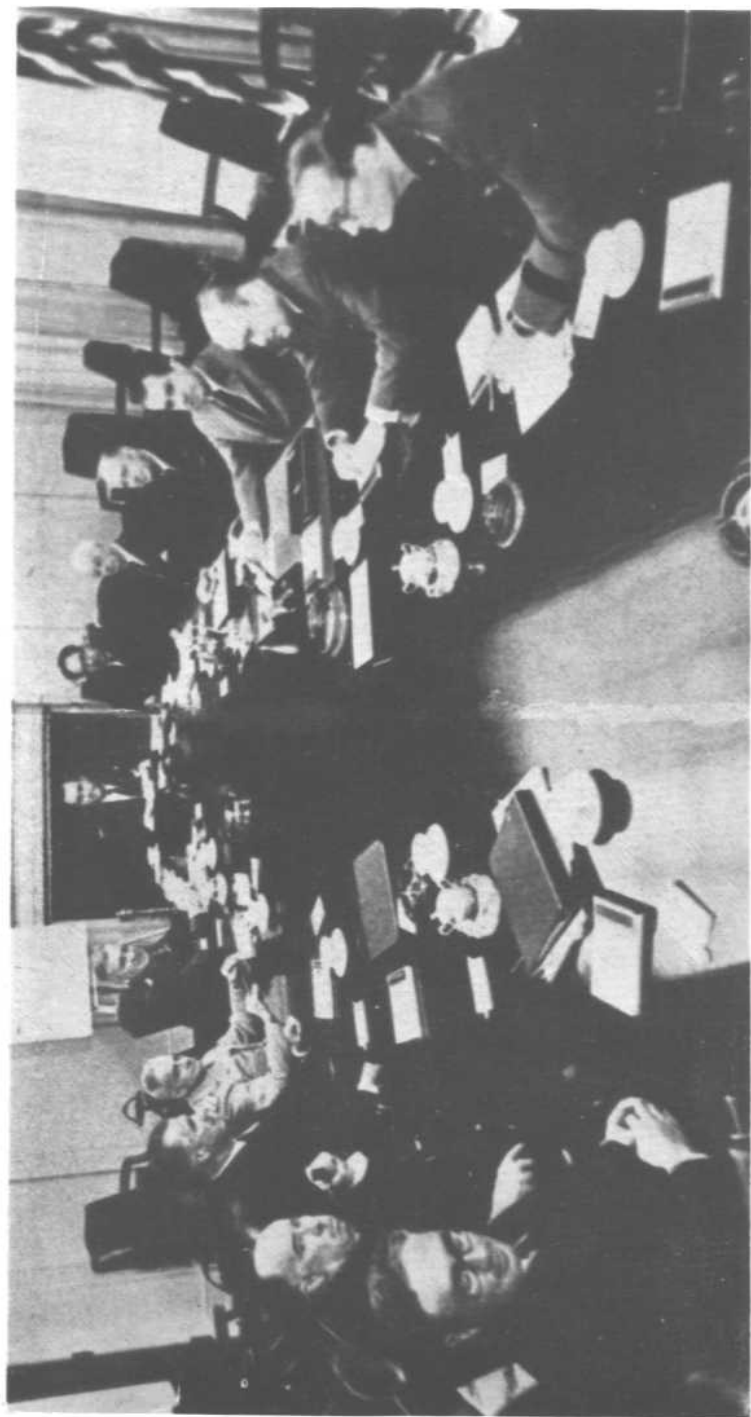
本书作者亨利·基辛格博士。



基辛格
和尼克松在
一起。

基辛格在他
白官地下室的办
公室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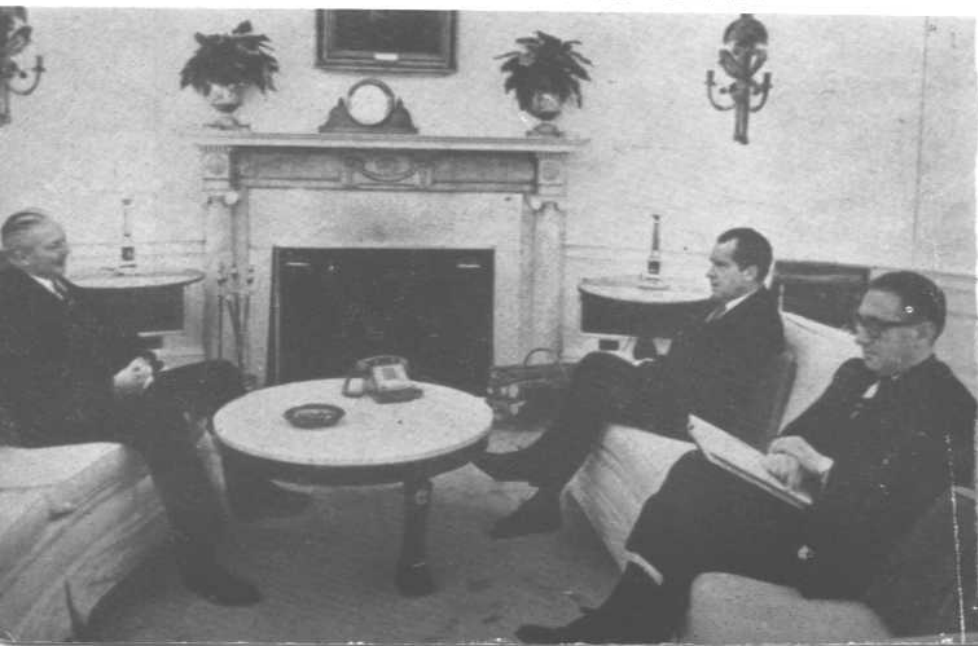
国家安全委员会于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二日举行会议讨论越南问题。自左向右：基辛格，米切尔，

阿格纽，海军上将麦凯恩，艾布拉姆斯，赫尔姆斯，哈比卜，邦克，罗杰斯，尼克松，莱尔德，惠勒将军。



基辛格同军事助理
亚历山大·黑格上校（左）
和行政助理伊格尔伯格。

尼克松、基辛格和西德总理库尔特·基辛格。



目 录

前 言	1
-----	---

第一部分 上任伊始

第 一 章 应召	6
第 二 章 天真无知的时期：交接工作	25
第 三 章 一个初出茅庐政治家的信念	75

第二部分 一九六九年：旅程开始

第 四 章 欧洲之行	98
第 五 章 同莫斯科下的头几步棋	150
第 六 章 走向中国的最初步骤	216
第 七 章 防务政策与战略	254
第 八 章 越南问题的苦恼	296
第 九 章 上任之初在亚洲遇到的考验	416
第 十 章 言论和幻影：中东战略的演进	455
第十一章 不愉快的联盟：欧洲和美国	507

前 言

不管怎么说，我应召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和执行中扮演了一个显要的角色。起先是当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来是当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的国务卿。这本书就是叙述理查德·尼克松的第一任总统期间我国的外交政策，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选举后我被任命为国家安全顾问开始一直到越南谈判结束——大体上是一九七三年一月尼克松第二次就任总统的时候。这只能是我个人所见到的历史，描绘的是我所见所想和所作所为，不可避免，我必须对这些事件加以选择和压缩。从历史学家的意义上来说的完整的记载，必须等到其他文件、回忆录和传记——并不都得是美国人的——发表之后。

本卷所涉及的时期是国内分裂和国际动荡的时期。在这段时期中，美国进入了这样一个世界，在这里我们不再处于支配地位，但仍然拥有巨大的影响。这是一个痛苦的、但是我希望并不是没有成就的过渡。它开始了美国对自由社会的前景作出新的贡献的过程，这种贡献从长远来说也许能带来更大的发展。对有些人来说，本卷对于一些有争议的问题、特别是对越南战争的处理，将从街垒的一边看问题，而这一边是他们所不熟悉的。在这里，我的叙述尽可能忠实于事实，目的是为了和解，而不是为了重提旧事，企图在辩论中得分。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只有承认街垒两边的人都是严肃认真的，才能对我们的分裂采取超脱的态度。

在下一卷里，我想写的是从一九七三年一月到一九七七年一月这段时期的事情，其中大部分时间，我是当国务卿。在那一卷

里，我将讨论这样一些问题：水门事件和理查德·尼克松辞职；一九七三年十月的中东战争和之后的“穿梭外交”；石油危机之类的国际经济问题和南北方对话；南部非洲问题；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倒台和我们的拉美政策；共产党接管印度支那；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与中国关系的发展；杰拉尔德·福特的担任总统和一九七六年的竞选，等等。在有些问题上，我可能追溯到一九六九年——一九七二年时期的事态发展，这些事件，由于篇幅和连贯性关系，我在这里予以省略。手里拿着这本厚书的读者，可能难以相信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包括在这本书里，但他也许会感到高兴，有些事情确实被留到第二卷再谈。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尽量设法不依靠记忆。我参考了许多文件，在书中所谈的某一段时间，还有我自己的日记。我想把这部附有注释的书和我的文件一起留给学者们使用，他们将来也许会更详细地回顾这一个时期的历程。

在这样一个备忘录和复印机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官僚文牍日益蔓延和无事不作记录的时代，有一件咄咄怪事：写历史也许已经变成几乎办不到的事情了。

当一个历史学家撰写前几个世纪的历史时，问题是要找到足够的当时的材料；当他写现代外交的时候，问题是要避免被太多的材料淹没。如果让一个具有完美无缺的资格证书和无懈可击的客观态度的学者任意使用现代任何一个四年时间的数以百万计的文件，他的最大困难将是不知从何着手。长篇累牍的书面记录说明了问题，也会模糊一些问题；这种书面记录没有提供尺度，来判定哪些文件的制订是为了推卸责任、找寻借口，哪些文件真正指导决策，哪些反映了实际的参与，哪些是在根本不了解重大事件的情况下制定的。在快速电讯联络的时代以前，上级给一个谈判代表的指示必须是概念性的，因此人们可以从这些指示中看出政治家们

的想法；在电传的时代里，这些指示通常是策略性或者技术性的，因此不谈较大的目的和前提。我们时期的官方档案不一定会透露哪些决定是绕过了正式的程序通过“小道途径”作出的，哪些决定是口头作出，而从未成为正式记录的一部分。参加谈话的人对谈话的叙述往往是事后的自我辩解。（迪安·艾奇逊曾经说过，他从来没有读到过一份谈话报告、作者不把自己说成是辩论中理由最充分的一方。）通过有选择地使用文件材料，一个人想证明什么，就能证明什么。目前人们未经许可或者擅自作主把文件透露出去的做法，几乎使得人们在编写每一份文件时都要考虑到怎样保护自己。新闻工作者的所得就是历史学家的所失。

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在写他的报告的时候，自然也难免有这种倾向。显然，他的视野将受到他自己参与程度的影响。想说明问题的意向是与为自己辩护的意向结合在一起的。但是，一个参加者对写历史至少可以作出一个重要的贡献：他知道在无数可能的考虑中哪一些考虑实际上影响了他所参与的决定；他知道，在他看来哪一些文件反映了现实；他能够回忆起来，哪些意见得到认真的对待，哪一些遭到了拒绝，以及最后作出的决定所根据的理由是什么。这一切都不能证明他的判断正确，只能证明它的依据。一个参加者如果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撰写他的回忆录，那么他的回忆录就有可能帮助未来的历史学家判断事情的真相，即使是在（也许特别是在）时机成熟有了更多证据可以证明事态全貌的时候。

我深深感激那些帮助我写成这本书的人们。我的朋友、知己和十五年的好同事彼得·罗德曼监督调研工作，他自己也承担了大量的调研工作，并且帮助做了编辑、核对和许多其他的琐事。如果没有他，这个工作决不可能完成。另一位可信赖的同事和老朋友威廉·海兰对调研工作、特别是关于欧洲、东西方关系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调研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在政府中的另外两

个同事罗斯玛丽·尼赫尔·尼赫斯和玛丽·布劳内尔在调研工作和审核手稿方面非常熟练，专心致志，给我帮助不小。

温斯顿·洛德和威廉·罗杰斯出于友谊答应阅读此书的全文。他们提出了许多明智的建议，并且在编辑上作出了宝贵的贡献。看过部分手稿的人有布伦特·斯科克罗夫特，劳伦斯·伊格尔伯格，戴维·金斯伯格，理查德·赫尔姆斯，约翰·弗里曼，塞缪尔·哈尔彭，杰西卡·卡托和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我并不是说我采纳了他们所有的建议，但是我热诚地谢谢他们的努力。

哈罗德·伊万斯在奥斯卡·特尼尔的协助下以卓越的编辑眼光读完了全书。他们教会了我，熟练的、明智的编辑工作如何能够帮助搞好文章的组织和写出漂亮的散文。贝特西·皮撒和利特尔、布朗出版公司的已故的内德·布雷德福精细地阅读了手稿，对我很有帮助。梅利莎·克莱门斯熟练地做完了索引。凯瑟琳·德西博，凯思林·特罗亚和杰弗里·亚克尔协助做了调研工作。

我感谢国会图书管理人丹尼尔·布尔斯廷，手稿处的男女工作人员：约翰·布罗德里克，保罗·赫夫龙，约翰·诺尔顿和他们的认真负责的助手。我感谢他们的服务、协助和保管我的文件。他们提供的工作安排对我和我的工作人员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本书中对于保密材料的处理是和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博士办公室一起拟定的，在这里，我也向他表示感谢。尼克松总统也欣然同意让我援引他的总统档案中的一些材料。

我特别感激我的私人助手克里斯廷·维克先生，他负责组织手稿的处理和几个草稿的打字工作，同时还努力安排好我的日常事务。谢里尔·旺布尔和玛丽·贝思·巴卢塔也极其专注地帮助打字。大家都加班加点地工作。

我的妻子南希用她的建议和爱情来鼓励我，象往常一样，她是

我的良心的一面镜子。

我把此书献给纳尔逊·洛克菲勒。他是我二十五年来朋友，今年一月不幸逝世。

我个人对此书的内容负全责，正如我对书中所记述的我的行动负责一样。

于华盛顿特区 一九七九年六月

第一部分

上任伊始

第一章

应召

总统就职典礼在一个天气晴朗、寒风凛冽的日子举行。我坐在台上，就在新内阁成员后面，眼看着林登·约翰逊在《向领袖致敬》的乐曲声中最后一次在过道上大踏步地走过。我不知道这位有权势的悲剧人物在结束一个以崇高愿望开始、而以痛苦的分裂告终的任期时心里作何感想。这个得到一致拥护的人最后如何导致了一个国家的分裂？约翰逊象一只笼中之鹰，傲然挺立，志不可侮，他的两眼凝视着他现在再也无法攀登的远方高峰。

在另一阵吹奏声中，当选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国会大厦台阶的最高一层上出现了。他穿着一件晨礼服，裤脚总是稍嫌短一点。他的下颚突出，有点轻蔑的神情。然而他又似乎没有把握，好象不敢相信自己真是站在那里。他同时流露出松了一口气和不相信的心情。他在经过了一段预想不到的历程和表现了美国政治史上最不寻常的一次自我约束精神之后，终于如愿以偿。他似乎很得意，好象等不及仪式结束就想开始实现他平生的梦想。但是他也显得精疲力尽，甚至虚弱，好象一个长跑运动员，在一次马拉松赛跑中使尽了浑身的力气。和以往一样，很难断定尼克松真正欣赏的究竟是眼前这个场面，还是过去对这个场面的憧憬。他走下

台阶，以坚定而低沉的声音宣誓就职。

纳尔逊·洛克菲勒

我对自己能出席这个场合感到意外，这是可想而知的。仅在八个星期以前，如果有人说我会以新总统最亲信的顾问之一的身份参加总统就职典礼，那一定会显得十分荒唐。在此以前，我在政治生活中所接近的人们都自认为是理查德·尼克松的死对头。我在哈佛大学教书已有十多年，哈佛教授们瞧不起尼克松已经成为固定的正统观念。而对我一生影响最深的一个人，曾经两次争取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而两次都被尼克松所击败，那个人就是纳尔逊·洛克菲勒。

纳尔逊·洛克菲勒在一九五五年作为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把我引进了高级决策班子。他召集了一批学者，其中包括我，为总统起草一份关于外交政策根本问题的文件，这个问题就是美国如何能够在国际事务中掌握主动、明确它的长远目标。

这是一次有启发性的聚会。洛克菲勒走进房间，拍拍每个与会学者的肩膀，微笑着，用与他记忆中各人的教名最相近的称呼叫每一个人。然而，这一表现和他的纯粹美国式的魅力加在一起倒使人产生了一种疏远的感觉：对每一个人都以教名相称而且都同样地友好相待的时候，这种关系就失去了个人的意义。我们每一个人都为自己接近了权势——而且我敢说也接近了财神爷——而感到陶醉。洛克菲勒坐着，听我们各人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尽力用自己切合实用的聪明才智来打动他的心。教授们一个个欣然拿出聪明的策略见解：如何左右别的国家，或者至少左右它的官僚机构；如何对付一个我们所不了解的总统；或者是（国家安全顾问们

长期遇到的问题）如何压倒一个同样不熟悉的国务卿。当我们讲完了的时候，洛克菲勒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紧皱眉头（我后来非常熟悉他的这种表情，这种表情说明谈正经事的时候到了）说道：“先生们，我把你们请到这里来，不是叫你们来告诉我在华盛顿应该如何运筹帷幄——那是我的事情。你们的任务是告诉我什么是正确的。如果你们能够说服我，我就去向总统提出。如果我不能说服他接受，我就辞职。”

洛克菲勒是说到做到的。我们写了一个报告，里面有一个主张，即“开放天空”的建议被接受了。提出长远目标的章节被删除了，部分是因为国内普遍存在的自满情绪，但是更主要是由于一个有权势的、坚持己见的国务卿对此表示反对。洛克菲勒在一九五五年年底辞了职。

我曾参与过一个典型的洛克菲勒尝试。在我所认识的社会名流中，他对思想意识的力量具有最绝对的、几乎是令人感动的信心。他花了极大的力量去探求什么是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他的竞选活动是根据这样一个幻想来进行的，即在政党的全国大会上争取代表的办法是，提出高人一等的有实质内容的纲领。他花在演说上面的时间多得简直叫人受不了。尽管看来也许并不典型，但他的无限精力、他的求实天才和他的百折不挠的乐观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纯粹美国式的。障碍是要去克服的；问题就是机会。他决不能设想有什么错误是不能纠正的，有什么正当的愿望是不能实现的。对别国人民来说，乌托邦是一个永远不可复得的神圣往事；但是，对美国人来说，只要他们立意去争取，它就不难到手。

我确信，纳尔逊·洛克菲勒本来会成为一位伟大的总统。他完全具备果断勇敢、远见卓识这样一些当领袖的品质。但是，就在他的目标有可能实现的当口，一次在一九六〇年，一次在一九六八年，他却一反本性，犹豫不决起来。为了他的信念，他可以冷酷无

情；他百折不挠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但是，在他身上，也存在一种深刻的矛盾心理。某种贵族气质的道德上的考虑牵制了他，使他不能一心一意、全神贯注地去争取这个宝座，这种全力以赴的精神状态曾经使他为了使自己配得上当总统而耗竭全部精力。他的整个教养使他不愿在他想要为之效力的人民面前显得他似乎是在追求个人的目的；他感到自己已经是一个幸运儿，无权为自己个人再要求什么东西。所以，他谋求当总统的办法是，设法向全国人民提出关于这个国家的潜力的最全面的见解以及如何实现这种前景的最好蓝图。

从深处来看，纳尔逊·洛克菲勒是吃了非常有钱的人在权利均等的社会里天生吃不开的亏。他要证明，他已经超越了本来就是混淆不清的事情：他的事业是靠他的本领，而不是靠他的财富，他所以能做这一番事业是由于他的成就，而不是他的世袭。在具有贵族传统的国家中——例如在英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很久——上层阶级深信，担任公职是他们的权利，因此身居高位，去就自如，当仁不让。可是在美国，名门望族的子弟却极怕被人指摘公然依仗财势而得到权力。他们认为，必须靠自己的本事来取得职位。但是，正如一个美丽的女人难以断定，别人对她的爱慕只是“为了她这个人”一样——其实，她这个人也是和她的美分不开的，在美国，一个有钱的人也很难断定是什么使得他担任公职的。如果他幸运的话，他就会及时地知道，这中间并没有多大差别。对一个身居高位的人，人们是以他所解决的问题和取得的成就来衡量他，而不是以他的钱、或者那些捧他上台的人的动机来衡量他。历史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他的得天独厚，而是根据他的成就。

这个难题，纳尔逊·洛克菲勒始终没有充分予以解决。在他不幸逝世之后，有人说，他虽然是洛克菲勒家族的人，可是终于没